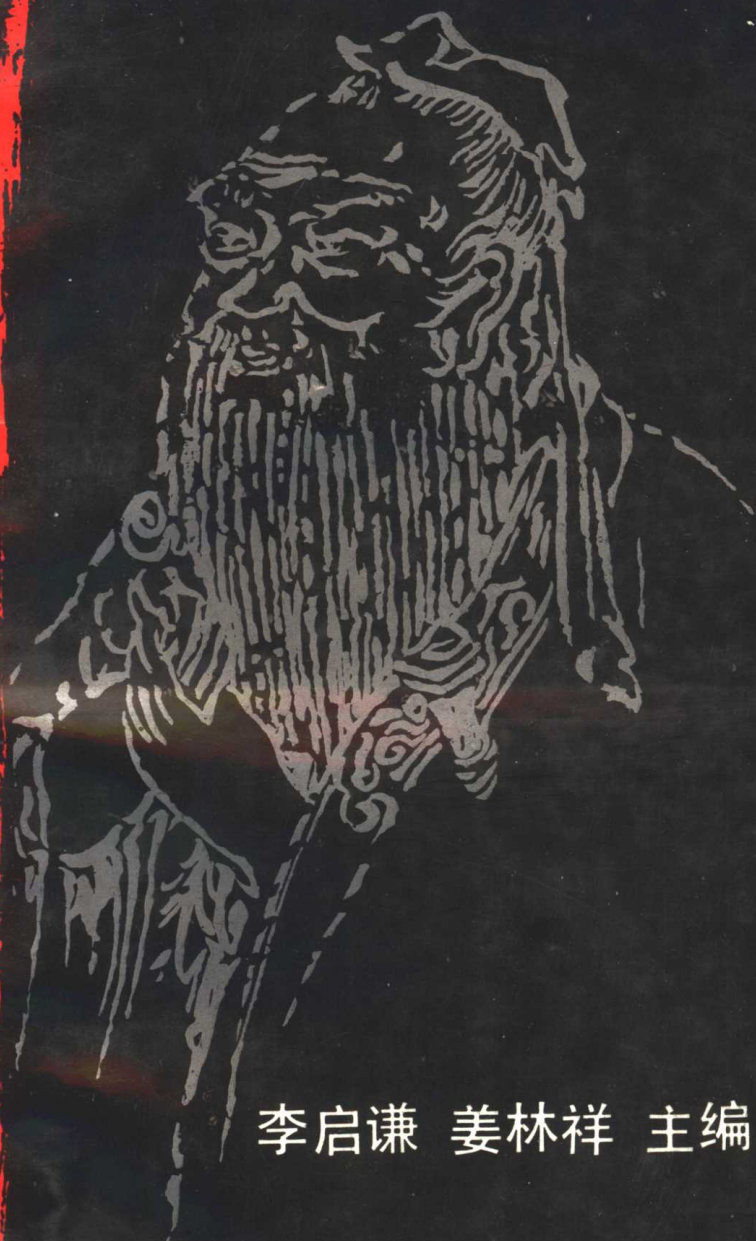


《孔子研究丛书》



李启谦 姜林祥 主编

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

■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李启谦 姜林祥 主编

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9号

责任编辑 崔志远

封面设计 马 强

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

李启谦 姜林祥 主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邮编300191)

山东省汶上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0印张 240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7-80563-251-0/G·039

定价5.20元

孔子研究丛书

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

主编 李启谦 姜林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丛书》编委会

顾问 匡亚明 宋法棠 金景芳

宫达非 辛冠洁 张健

主任 徐宝庆

副主任 陈信泰 李启谦 李金山

姜林祥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守元 王钧林 邓承奇

许凌云 李启谦 李金山

陈信泰 苗润田 姜林祥

骆承烈 徐宝庆 黄清源

韩延明

《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撰写人员

主编 李启谦 姜林祥

参加编写人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李启谦 李景明 李如密

杨朝明 杜振吉 张宗舜

张良才 姜林祥

目 录

导 论	孔子研究的历史回顾·····	(1)
第一章	孔子的基本思想·····	(16)
第一节	孔子思想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16)
第二节	孔子思想的基本内容·····	(20)
第二章	孔子思想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	(35)
第一节	孔子思想“独尊”地位的确立·····	(35)
第二节	经学全盛时代的孔子思想·····	(43)
第三节	孔子思想与道家、佛教思想的斗争和融合··	(51)
第四节	孔子思想与理学的兴起、发展·····	(59)
第五节	孔子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坎坷命运·····	(66)
第三章	孔子思想在国外、海外的影响·····	(74)
第一节	孔子思想在东亚、东南亚各国·····	(74)
第二节	孔子思想在欧美各国·····	(94)
第三节	孔子思想在港澳台及外籍华人中的影响··	(105)
第四章	孔子的政治思想与当代社会的和 谐、协调及稳定发展·····	(116)
第一节	注重道德教化,反对独用政刑·····	(118)

第二节	倡导平政爱民, 反对富而不仁·····	(128)
第三节	主张举用贤才, 反对任人唯亲·····	(135)
第五章 孔子的伦理思想与当代社会精神		
	文明建设·····	(143)
第一节	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	(144)
第二节	智德观、义利观与人生观·····	(160)
第三节	注重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	(177)
第六章 孔子的管理思想与当代社会管		
	理·····	(189)
第一节	重视人的因素·····	(191)
第二节	重视管理教育·····	(195)
第三节	重视领导者的品格·····	(202)
第四节	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	(215)
第五节	重视管理秩序的稳定·····	(225)
第七章 孔子的中庸之道与当代社会思想		
	方法·····	(231)
第一节	反对“过”与“不及”, 主张执中·····	(231)
第二节	提倡“和而不同”·····	(237)
第三节	主张“权变”与“时中”·····	(245)
第八章 孔子的教育思想与当代社会		
	教育·····	(256)
第一节	有教无类, 培养贤才·····	(256)
第二节	编写教材, 传播文化·····	(264)

第三节	启发诱导，因材施教·····	(269)
第四节	砥砺道德，改过迁善·····	(279)
第五节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288)
结 束 语	孔子思想与未来社会·····	(297)
后 记	·····	(307)

导 论

孔子研究的历史回顾

孔子思想、儒家学说和现代社会生活能否协调？对我国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是起阻碍作用，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是自“五四”以来的七十余年间一直没有从理论上彻底解决的问题。从“五四”一直延续到二三十年代的文化论争是如此；八十年代出现的“儒学热”也是如此。

“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是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如何自强、如何实现现代化等问题而展开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始，继英国殖民主义者以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壁垒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便一步步地将中国逼进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被摧毁了，中国社会内部固有的进入资本主义文明的萌芽也被扼杀了。在此情况下，中国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便积极寻求变革社会的途径，于是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便围绕着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和未来命运展开了争鸣，并且出现了许多思想派别，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三大派：一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又叫西化派），一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

自由主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胡适认为，中国的贫弱落后和民族危机，是由于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造成的。他举例说：中国“独有的宝贝”就是“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

板子夹棍的法庭。”（《信心与反省》，《胡适论学近著》第483页）在胡适看来，也正是这些东西暴露了中国文化传统保守、落后的内在本质，造成了无法医治的民族心灵的痼疾，成了变革现实的最大障碍。因此，胡适主张全面抛弃中国文化传统，“全盘西化”，用西方文化来取代中国文化，用西方近现代发达、进步的文化取代中国落后、保守的传统文化。实质上，胡适要全面照抄照搬西方经验，让中国走西方工业文明即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胡适虽然揭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弊病，但他却主张把西方文化机械地移植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不仅是开错了药方，而且亦被实践证明此路不通。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而猛烈抨击和批判。他虽然也说：“孔子不信神怪，是近于科学的”，但其主要着眼点是批判。陈独秀认为，在中国国民身上体现出来的诸如不务实际、崇尚虚文等等恶俗陋习，主要来自儒家消极思想的腐蚀和熏陶，这些恶劣习俗是与现代生活大不相侔的。他说：“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专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现代生活背道而驰。”（《告青年》）他以现代西方文明为时代的座标，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西方文化完美无瑕，中国文化无一可取，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以根绝传统文化为根本前提，以输入西方文化为唯一取向。“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输入现代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陈独秀等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虽然对推动我国思想文化的不断进步和国民的不断觉醒，起到了积极地启蒙作用。但由于他们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仍然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方法，把实现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绝对对立起来，误以为现代化必须以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为前提，所以他们仍然没有从理论上解决

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文化保守主义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又被称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创人物之一。他在“五四”批孔、批儒，“打倒孔家店”的一片声浪中挺身而出，公开打起了维护传统的旗帜，他认为“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吾民族实负有开辟世界未来文化之使命，亦为历史所决定。所谓民族自觉者，觉此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96页）。他推崇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特别强调孔子的人生哲学和道德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他说：“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专谈现实生活，不谈现实生活以外的事”。“这个生字是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年商务印书馆，第199页、214页）他认为在今天，只有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所表现的人生态度于现实是最合理，“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同上，第199页）。他还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各有自己的价值，中国与西方存在着“人生路向”的不同。他也主张对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只不过“对其态度要改一改”（同上，第202页），认为中国今天要走的路应是“以中国的态度走西方的路”。贺麟先生对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作了中肯的评价，他说：“他一面重新提出儒家的态度，而一面主张全盘接受西方科学和民主，亦未完全逃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圈套。”（《当代中国哲学》第12页）由于梁漱溟过分强调了中西文化的对立性质，所以他也找不到不同文化可以相互融合的内在根据。

上述三派思想家虽然都有救亡同存的爱国激情，都想开一个灵验的药方来解决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现实出路问题，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们各执一端，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孔子思想、儒家学说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历史进入八十年代，思想界又出现了一股“儒学热”。这个

时期，从中国海峡两岸到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以至德、法、苏、美许多国家和地区，举行了多次有关儒学的学术讨论会，其中有不少为大型国际会议，这些会议涉及人物之多、问题之广泛都是空前的。同时，有关儒学的论文、专著犹如雨后春笋竞相刊布，仅中国大陆几年时间即出版专著数百种，论文更数以千计。这股“儒学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有着广泛的社会背景。归纳起来有这样几个原因：其一，最近二十几年来，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经济上的迅速崛起，冲破了现代化即等于西化的单一模式，出现了有别于西方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东亚模式。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又恰恰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这就必然引起人们探讨儒家传统文化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超常发展之间联系的浓厚兴趣；其二，西方的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并不都是幸福，它也带来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诸如生态环境的破坏，人际关系变得冷漠而功利，嗜毒、色情，凶杀、嬉皮、同性恋等问题的严重存在，使得人们的精神极端空虚、渺茫。因此，许多学者把眼光转向中国古老的儒家伦理，希图在东方文化中寻求能医治西方现代病的一剂良药；其三，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使得一些海外华裔学者产生了一种民族“寻根”意识，希望中国文化得到世界承认，以提高和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其四，就国内来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任务也提到日程上来，这是一个牵涉面相当广泛的系统工程。其中，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也必然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

八十年代的“儒学热”虽然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而深入，但国内外相当关心的还是主要集中在儒学思想在今天和未来的地位及价值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儒学复兴论。认为自“五四”以来，反传统过了头，丧失了民族文化的价值权威。中国经济之所以屡遭挫折，反儒是

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必须变反儒为扬儒。他们认为，儒家思想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文化资源。有的还以日本为例，认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期，已完全背离了西方的模式，是一种国家的、家长制的、反个性的资本主义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儒家思想主要是其伦理道德观念，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仍有机地存在于日本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并且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起到了巩固和推动作用。他们认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东方现代化的模式，即儒家资本主义，足以证明儒学传统可以开出现代化的科学民主之花。

另一种观点是彻底重建论，即主张彻底反儒。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摧毁传统的枷锁，彻底重建新的传统。因为儒学对现代化起了阻碍作用。其理由是，①儒学长期以来阻碍社会的进步，致使封建社会漫长，生产力不发达。具体说，儒家提出的天下为公与大同理想，只是对原始社会农村公社的向往，这是开历史的倒车，不能引申出近代民主的观念，相反，却成为导致专制集权的文化温床；以“贵义轻利”和“重道轻器”为核心的儒家传统价值系统，与现代化的民主与科学是背道而驰的，是对自然科学的扼杀和对道德的扼杀；儒家有关人文思想，从其主流看，导向的恰恰是王权主义和使人不成其为人。历史证明儒学对中国社会起消极和阻碍作用；②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与之相适应的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儒学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与社会主义新文化毫无相容之处；③东南亚经济的起飞也并不是得益于儒家精神，而是战后经济新格局的结果，以此来论述儒家思想的合理性是行不通的，因此，必须补上批儒这一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人写文章对这股“儒学热”大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股“尊孔热”，对孔子评价之高，影响所及，到了自撤藩篱、丧失阵地的惊人地步，使人们模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对立哲学和世界观的界限，甚至混淆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封建主义的根

本区别。

第三种观点就是批判继承说。持这种观点的居多数，但如何具体的批判继承又有许多不同看法。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这样一种意见，认为既要看到儒学消极的一面，也要看到积极的一面，要使儒学服务于中国现代化事业，必须进行创造性转换。要实现儒学的现代转换，必须具备以下前提和内容：一是使儒学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的文化因素，发掘儒学中富民、立功和廉洁等积极因素；二是使儒学与科学、民主、法制、教育等现代文化内涵结合起来，克服其封建因素；三是中西文化相兼互补，吸收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使中国文化在扬弃传统的过程中实现现代化。对此，一些同志提出，儒学的理想人格和道德精神，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仅有借鉴作用，而且还具有永恒的道德价值，具有普遍使用的意义。

八十年代的这场文化论争，同“五四”时期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从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来说又有本质的不同。六、七十年前，“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并不十分清楚，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还没有完成，因此对待文化遗产，就多数人来说，还不可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加以分析研究。时至今日就大不相同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已成为国人的共识，我们又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方法作指导，还有一个和谐的良好学术争鸣的社会环境，可以预期，传统文化的研究必将继续向纵深发展，结出更丰富的硕果。

我们以为，要回答孔子思想、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生活能不能协调的问题，必须有一个基本立足点，那就是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出发对历史遗产作价值判断，对建设现代文化有用处的、有益的东西，或者直接拿过来使用，或者经过加工改造再使用，即使无用甚至有害的东西，只要科学的加以批判，变

腐朽为神奇，也可从反面促进现代文明的建设。鲁迅说的好：“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是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查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到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鲁迅全集》第3卷第23页）所以，我们只要谨慎地、细致地对儒家思想加以分析，就能找出有利于创造崭新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精华。

鉴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孔子思想、儒家学说中，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及其新文化建设有积极作用：

第一，孔子、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对当今社会的道德文明建设有积极作用。孔子人生的最高理想是“成圣”，或者成为“仁人”。“圣人”、“仁人”在孔子思想中有广泛而明确的界说。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他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确认自己的愿望，也努力去帮助别人实现正当的欲望，“君子要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在个体与群体、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上，孔子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心。强调要积极入世，主张立功、立德，有所作为，对社会有所贡献。孔子一生非常向往尧舜文武周公，决心象他们那样有所作为，“知其不可而为之”。他常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这就是决心以发扬文化传统为己任。孔子还肯定人要有独立意志，提倡保持崇高的气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里体现了对人的独立地位的觉醒。后来，孟子则提倡大丈夫的崇高人格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强调刚强不屈，不随环境的变化而放弃原则，失去气节。这种独立意志表现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则是“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宪问》），“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论语·子张》），必要时应当为正义而献身，以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孟子说得更具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这里着重论述了生命与道德的相互关系，认为人格比生命还重要，这是很精湛的思想。在人生修养的原则上，孔子强调道德修养，力求提高道德觉悟。而这种道德修养的途径要靠主体的自觉，就是说要靠通过“内省”、“克己”的修持而达到。孔子讲的道德修持，又是和他的政治抱负紧密相连的。这便是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或者叫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就是指主体的内在修养，对真、善、美理想人格的追求；“外王”，就是把主体内在修养的所得，推及整个社会，建立一个王道政治的理想社会。“修身”，也是指的道德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实践。通过主体自觉的道德修养，去实现远大的政治抱负，这是孔子乃至整个儒家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当然，孔子的人生价值观是为特定的历史现实服务的，在封建社会里，靠道德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更是不可能。但是，也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都是有无数的个体组成的，从小己的自我来说，是个体的，但无数个体的同一精神的汇合就是民族的。换句话说，正是孔子及其后学所倡导的人生价值观深入人心，才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力、自强、自主的民族精神，也正是这些民族精神所构成的强大凝聚力，才使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续发展，一直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封建社会相比，当然会有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但它的最基本的社会细胞仍然是个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是靠一个个有觉悟的个体的力量的组合来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人生价值观，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现代的阐释，它仍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干部和群众中出现了许多以天下为己任、无私奉献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民族脊梁，正是这些民族脊梁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另一面，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价值观念、伦理思想和思维方式受到猛烈的冲击，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方式也伺机而入，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人生价值观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这种“世俗化”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消极影响绝不可忽视。比如人与人之间，强调个人本位，与己有利就干，无利就不干，“义”利交换成为他们的法则，甚至“有偿救命”也变得理所当然。在物质生活上，勤俭节约的风气减退了，大吃大喝、“能挣会花”、“吃光用光，不叫冤枉”，成了某些人的生活追求。在社会上“混日子”、投机钻营的心态也有所蔓延，一些人敷衍岁月，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人否定既定的社会原则和道德规范，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玩世不恭；某些干部热衷于窃权弄术、拉帮结派、言行异轨，甚至有的八面玲珑、“乡愿”本色，以保亨通。上述这些现象，严重地腐蚀着我们的肌体，败坏了我们的社会风气，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种破坏力量。因为上述问题大量的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单靠司法、监察、法律的外在威力是不够的，还要靠教育——革命的和传统的道德教育。如果我们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在人生价值观上，都能做一个具有崇高理想和境界、以天下为己任、立志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的话，那么，它必将汇集成巨大的精神力量，从而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第二，孔子、儒家对大同社会理想的执着追求，对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有积极作用。在中国历史上，从孔子、孟子到近代的康有为、孙中山，都有一个五湖四海天下为公的大同主义理想，尽管他们心目中各有各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但他们都为实现